

政治共识：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周显信 叶方兴

[摘 要] 在多元、异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迫切需要在政治生活中形成共识。关于政治共识的讨论应将视角由对共识的价值理念、获致方式，转由对共识达致所亟需的社会基础的讨论，从而将政治共识的研究引向政治社会学的路向。政治社会学视角把握了政治共识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了政治共识产生、实现所依凭的社会基础，在此之下获致的政治共识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当下，公民社会的到来为政治共识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对政治共识的研究越发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意义。

[关 键 词] 政治共识 政治社会学 视角 社会基础

[作者简介] 周显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叶方兴，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一、政治共识研究的视角转换

政治共识是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系统的价值、准则以及程序等方面所形成的一致意见，它为人们的政治生活提供了稳定性的前提，成为和平和有序地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些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社会和政治组织就不可能存在。”^①当下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悖论式”局面：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价值多元化思潮形塑了具有独立个体意识的社会成员，他们进行着积极、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生活出现多元化的景观。另一方面，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人们迫切地寻求政治价值、政治原则上的共合，以获致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在多元、异质的

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共识显得比任何时代都重要。如何在利益凭据不同、价值观念多元以及文化背景殊异的群体之间达成政治共识，就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当代思想大师中，不乏有人在学理层面讨论过共识问题。哈贝马斯运用“交往共识”的方法意图从人们的语言和交往实践中寻求价值共识的规范性基础。他认为当代哲学需要实现从“主体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范式转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个结合’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9BK014]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08MLB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主体间性哲学”主张自由、平等的交流对话,容易使人们达成理解,进而克服“主体哲学”缺乏对话所引发的“价值共识”困境。^①而当代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晚年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多种族、多文化的美国勾稽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共识。在罗尔斯看来,多元文化的事实是我们必须认可并且接受的前提,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前提下生活得更好。“理性多元的事实导致……政治的正义观念……我们希望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能够基于正当的理性,认可该政治观念,因而该政治观念被视为一种重叠共识。”^②他通过政治建构主义寻求一种“重叠共识”以保证所有公民都具有同等正义的制度,以便协调“不同的社会身份、阶级地位和职业所导致的冲突,或他们不同的种姓、性别和民族导致的冲突”^③。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共识的论述成为当下讨论政治共识无法绕开的理论资源。然而,无论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共识”,其共性在于对政治共识的讨论过多立足于理念与方法层面。如果说政治哲学对政治共识的讨论是基于价值层面而确立政治共识的类型(何种共识),政治学讨论政治共识是获致的一套关于政治共识的可行方法(何种方法),那么,我们有必要基于某一视角对政治共识形成的社会条件进行有效地勘察,以保证政治共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关于政治共识的讨论至少应避免出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成为理论上的“乌托邦”。政治共识是不同政治主体之间形成的关于政治价值观念、制度以及程序的一致性意见,其中不乏人们政治愿景之类的理想因素。在达致共识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对现实社会因素的考察,政治共识极易成为形而上学的理论玄思。况且,在学理讨论和政治实践中,基于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论原则或先验主义的方法勾稽政治共识并非罕见,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将政治共识引致理论上的“乌托邦”。二是缺乏稳定性。政治共识是政治主体一致性的观念,它内在地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达成的政治共识必然能够在一定时期里有效地引导、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政治共识的稳定性是立足于它的实现合理性之上,只有满足了实践解释力的政治共识才

会具有稳定性。政治共识的研究要克服这两个弊端,就必然需要将目光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

任何政治都依凭一定的社会背景,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而人们之所以在政治生活中达成某种共识,与他们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政治共识”的讨论应将视角由对共识的价值理念、获致方式,转由对共识达致所亟需的社会基础的讨论。因为在多元化现代社会中,尊重差异、承认多样不会招致反对,用一种尊重独立人格的“交往”、“商谈”方法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也较容易获得人们的共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创制社会条件使得持有不同政治价值观的利益群体形成并实现一致性的政治观念。举例来说,民主在现代社会早已获致了政治共识的地位,人们在理论层面进行民主的价值类型之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民主生成、发育所依凭社会条件的讨论。毕竟,“民主既是崇高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安排”^④。和谐社会在当前也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要求无论在官方文件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已有着明确的界定和阐明,但现在问题恰恰是如何在实现和谐社会需要的社会条件上下功夫。可见,对政治共识的关切更应将目光聚焦社会生活领域,将政治共识的研究引向政治社会学的路向。

二、政治社会学视域中的政治共识研究

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共识之间存在天然的相关性。李普赛特甚至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冲突”与“一致”(或“分歧”与“共识”)。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

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②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③ 同上。

④ 韩震《作为社会妥协的程序机制的民主》,载李鹏程等《对话中的政治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而“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歧和共识的根源上”。^①分歧与共识,或者说冲突与一致,是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条件。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分歧是民主的基础,只有存在分歧,才有必要通过民主方式求得社会的统一与协调。但是,分歧又必须严格限定在某种限度上,通过民主运作,方能达成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充满分歧的社会中寻求政治的共识。

政治社会学对政治共识的研究基于如下的假定:包括政治共识在内的整个政治现象都并非纯粹的、抽离的,而是源自特定的社会生活,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依凭一定的社会条件。任何政治现象都具有社会性,只有将其放置于社会背景中才能获得对政治的完满理解。奥罗姆指出“政治领域及其行为者并非脱离社会事物的孤立的因素,而视这个领域是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家庭)以及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这种特别的方法来进行这方面研究就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社会学。”^②政治社会学主要揭示“政治是如何决定于以及如何决定着社会中的其他事件的。”因为任何政治制度“必然根植于某种基础之上并且与其他各种制度相联系”,“有赖于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出现”。^③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讨论政治共识就是要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充分地考察政治共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政治社会学对政治共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共识形成的社会机制,即人们如何依据现实的社会条件来获致某种政治共识。人们通过对现实社会状况充分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政治价值、政治规则以及政治发展的一致性意见。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中国封闭、落后的现实,中国人民一致的共识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这一共识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上的。二是政治共识所亟待的社会条件,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长远的规划形成某种政治共识,并根据这一共识不断地创造相应的社会条件,完善社会基础。比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政治共识。为实

现这一宏伟政治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中的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特征创造社会条件,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三是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适时地调整和修正政治共识。由于政治主体的差异性,政治共识可能阶段性地适应人们的政治需求,满足人们的政治诉求。但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原先人人称同的政治共识可能会出现分歧,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此做出适度的调适。一般来说,政治社会学对政治共识主要囊括上述三个方面的讨论,其焦点在于政治共识与社会条件的适度与协调,这不仅是政治共识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也成为检测政治共识合理与否的有效判准。

当下,关于政治共识的讨论立足于如下的社会背景:当今世界是一个异质化、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共识的构建应充分地考虑到现实的差异性。“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和普遍要求民主化的社会,在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着性别、人种、信仰、等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排斥、依附和支配、边缘化、身份认同等诸方面的对抗意味着大量的实质性冲突,社会不是同一性基础上的实体,任何强调不可谈判的实质一致性的办法只能进一步导致排斥和敌对。”^④然而,由于作为政治共识主体的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要达成政治共识就需要充分考量各自在社会土壤上的差别与分歧。只有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中关照到不同政治主体的现实状况,才能保证人们所勾稽出的政治共识是合理和可行的。恩格斯曾以道德观念为例,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

① [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1页。

③ 同上。

④ [美]查特·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伦理观念”^①。他的这一揭示同样适用于政治观念。人们对于政治共识的立场和态度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政治共识能够保证其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

三、民主共识的社会基础—— 以《论美国的民主》为例

近代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讨论,可以为我们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政治共识提供诸多的借鉴和参考。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年代,冲突与共识问题成为人们首要的关注焦点。托克维尔曾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的时代“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至少,这个海岸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②当时的法国刚刚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界频频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不定,改变立场、转换阵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在19世纪的法国,不动摇、坚定成为受人钦佩的德性。”^③大革命时代的“暴民之治”与随后雅各宾的“恐怖专制”都令法国人民胆战心惊,如何重建政治秩序,选择一种政体以重新获致人们的共识已经成为迫切回答的政治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托克维尔前往美国通过9个多月的考察,写下了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经过对美国的观察认为民主不仅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美国人民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共识。《论美国的民主》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作为这一社会和政治共识思想的社会基础”^④。托克维尔在这部书中阐明美国之所以保持民主政体所依凭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民主的条件是如何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国民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发挥影响的。“社会条件一旦确立,它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调整国民行为的几乎所有法律、习惯和观念的根源;社会条件并不产生什么,它的作用就在于制约。”^⑤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克维尔的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他对政治的讨论始于对社会条件的探讨,因

为“社会条件是一种尤其独有特征的政治制度的根源”^⑥。强大的社会基础是民主得以扎根的条件。

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民主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平等性。在美国最吸引他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这种平等特征首先归因于美国人大多作为移民来到新大陆,他们摆脱了欧洲政治生活的束缚,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追求自由,同时也通过种种社会政策保证自由,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其中的社会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民间组织的自由发育。在美国,“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⑦。人们可以通过自由结社来维护自身的自由,在各自的组织中实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通过自由结社建立民间组织可以有效地维护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民主的政治社会。因为“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和大人物专权的了”^⑧。另外一个能够保证美国平等性民主的关键因素就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美国的开国者十分强调人们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言论以及出版的自由也被写进美国宪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⑨。言论和出版自由正是美国“主权在民”思想的具体体现,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大量的、多样化的出版物反映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

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民主平等性条件的同时,也专门讨论了美国人民达致民主政体这一政治共识的社会条件。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采用民主政体或者说能够有效维持美国民主政体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8页。

② 崇明《托克维尔的焦虑》,载《读书》2009年第9期。

③ 同上。

④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9页。

⑤ 同上书,第48页。

⑥ [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页。

⑦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213页。

⑧ 同上书,第217页。

⑨ 同上书,第290页。

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地理位置、法制和民情。“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位置;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①托克维尔沿用孟德斯鸠的传统,强调地理位置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作用。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东西濒海、陆上接壤的国家少、地广人稀以及自然资源丰富,这些都为新迁至美洲大陆的美国人选择民主社会提供自然条件。其次,美国有着完备的法制,立法、司法机关以及陪审团制度较为科学、民主,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后,民情也是维护民主政体的重要原因。从他列举的原因看,自然环境、法制与民情三者既有不同的权重,又有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从重要性上看,民情最为重要,法制次之,自然环境最后。但三者又都具有有一致性,都以民情为基础。民情是托克维尔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尤为注重社会生活中民情的重要作用。民情对政治社会乃至对整个民族而言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政治社会并非它们的法律的产品,而是从一开始就是由其成员的情感、信仰、观点和心灵习惯所决定的。”^②“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③“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④托克维尔笔下的民情“其含义与其拉丁文源自 mores 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⑤。它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理、性情,是人们的一种社会心理或政治心理,反映出对于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的某种心理态度。

可见,托克维尔对美国人达成民主共识的分析所遵循的是政治社会学的进路。他从社会生活中揭示出民主社会所依凭的社会条件。在他看来,“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普遍地到来”^⑥,民主无疑将成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一致共识。所以,托克维尔才将讨论的视角转向对民主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论述。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托克维尔中性、客观地揭示了民主这一美国人的政治共识的优劣。“我想弄清楚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

和害怕它什么。”^⑦他不仅强调了民主的产生条件,同时也不无忧虑地道出了民主可能带来的危害。他对政治的社会条件之特殊强调,以至于李普赛特在自己的《政治人》中指出“政治社会学应当回到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必要性和社会后果。”^⑧应当承认,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分析堪称对政治共识进行政治社会学分析的典范。

四、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实践命意

在当下,逐步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政治共识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社会学理路讨论政治共识越发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意义。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⑨。严格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现代以来,社会结构逐步分化的产物。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个由共同体向社会(滕尼斯)、身份向契约(梅因)、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涂尔干)转变的过程。较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变化在于社会结构上的转型:传统的整体性、同质性社会结构不断地被现代碎裂性、异质性社会结构所取代。“与传统社会结构完全相反,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恰恰是‘异质性’和‘分化性’。这种‘异质性’和‘分化性’充分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从原来的以政治领域为绝对核心逐渐转向各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主,从而实现了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转向;二是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分离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320页。

② 同上书,第358页。

③ 同上书,第315页。

④ 同上书,第315页。

⑤ 同上书,第332页。

⑥ 同上书,第1页。

⑦ 同上书,第16页。

⑧ [美]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17页。

⑨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出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存在空间。”^①可见,现代社会成为锻造公民社会的“母体”。与公民社会的产生相伴的是,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整体性的“社会气质”转型:利益主体不断地趋向多样化、复杂化,政治生活讲究民主、法治,个人的社会角色呈现出碎片化、异质化,在价值观上追求个性化、多元化。

在这样一个由自愿的个人、组织以及社会团体所构成的独立的社会领域中,公民社会在政治共识的问题上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产生共识的目的已经不仅仅限于将全体社会成员置于一个共同的政治生活框架、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而且需要影响甚至干预政府的政治生活安排。因为公民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已经逐步成为影响甚至制约国家权力的政治主体,而公民社会本身也成为一支区别于国家权力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查尔斯·泰勒断言,当自治组织影响国家政策和整个社会的时候,公民社会就出现了。^②其次,公民社会中的政治主体日趋多元化,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充分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一般来说,发育完全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高度的政治民主化水平的基础上的。其中的社会成员体现出充分的个体意志,积极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在政治生活中秉持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按照阿尔蒙德和维巴等人的说法,公民社会在外部影响国家权力的同时,也具有内部效应。其内部效应具体地体现为培养社会成员合作习惯、公共精神,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质以及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等等。尽管这些内部效应为社会成员之间达成共识提供主观性的条件,但公民社会中政治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趋向的离散化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最后,独立的公民社会领域的发育以及政治生活出现的多元主体景观无不表露出不同的政治主体要在价值、制度、程序层面获致某种程度的一致已经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简单了。传统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整体性、同质性,个人、社会、国家三者高度地一致。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家的声音、社会的声音与个人的声音是相同的。在政治制度设计、政治价值观念认同的问题上,并不会出现异

质、异样的抉择,统治阶级的政治选择便是政治共识。

这样,如何在多元的政治主体中获致政治共识(在“多”中获得“一”)俨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价值层面的思辨问题或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获取政治共识的社会基础的问题。因为政治共识是政治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而公民社会中的政治主体是多元的,他们呈现出的是个体的独立性、利益的非均衡性以及政治愿望的差异性。只有关照到不同政治主体在物质生活、文化背景、利益表达、政治参与上的差别与一致,才可能在公民社会的构建中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达致政治共识。

实际上,政治共识的获致与公民社会的发育是同步的,公民社会的建设为政治共识的勾稽、稳定以及有效提供充足的社会条件,确保多元主体能够达成政治观念、制度以及程序上的一致。一般来说,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市场经济健全与完善、政治民主化建设、政治文化的建设、社会参与的扩大、社会自愿组织的建构等要素都是政治共识实现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在公民社会的背景下,政治社会学对政治共识的研究不仅在宏观上揭示政治共识与公民社会的内在关联,还会在微观上分析公民社会建设具体路径之于政治共识的意义。所以,政治共识的形成必然建立在充足社会基础之上,而政治社会学也必将成为政治共识的一个合理、可行的分析视角。

(责任编辑:李义天)

① 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邓正来、[英]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1页。